

热历史

虞舜：德孝文化始祖

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孝悌文化，是中国原始社会鼎盛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。舜对整个华夏民族的道德建设具有发轫之功。西汉时孝悌观念进一步纳入了国家政治制度的范畴，孝悌意识不但规范着家庭秩序和社会等级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伦理制度，影响着国家秩序的建立与完善。

刘逸群

德至舜明
流放四凶远离邪恶

舜是华夏民族道德文化之根，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孝悌文化，是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。

《尚书》明确记载：“德至舜明。”汉代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说：“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。”又在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中说：“舜之德可谓至矣。”并由衷感叹道：“舜耕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雷泽，雷泽上人皆让居。”司马迁将天下明德“始”“至”都归功于舜。

舜是“至孝”的化身，华夏传统伦理道德文明的鼻祖。杜方智教授提出：“如果说，黄帝文化是政体文化，炎帝文化是农耕文化，那么，舜帝文化则是道德文化。”

舜在20岁时就孝名远播，被四岳推荐给了尧帝。少年时，面对亲生父亲和后母的百般虐待，舜总是逆来顺受，时时处处谨言慎行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虽然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死劫难，却毫不嫉恨，孝心不改，以德报怨。

舜成为部落首领后，仍怀有一颗仁慈之心。拒绝不仁不义之人对部落的影响。帝鸿氏有个不成材的



▲盐湖区舜帝陵景区舜帝抚琴像 记者 刘亚 摄

后代，昧丧理义，包藏祸心，好行凶作恶，天下人称其为“浑敦”，意思是说他野蛮不开化。少皞氏也有个不成材的后代，毁弃信义，厌恶忠直，喜欢邪恶的言语，天下人称他为“穷奇”，意思是说他怪异无比。颛顼氏也有个不成材的后代，不可调教，不懂得好话坏话，天下人称他为“檮杌”，意思是说他凶顽绝伦。这三族，世人都害怕。缙云氏有个不成材的后代，贪于饮食，图于财货，天下人都称他为“饕餮”，意思是说他贪得无厌，天下人都憎恨他。饕餮与浑沌、穷奇、檮杌并称为“四凶”。舜果断下决心流放了这四个凶恶的家族，把他们赶到了边远荒蛮的地区，天下从此家庭和睦，父慈母爱，兄友弟悌，长幼有序。

注重孝悌
形成宗法伦理制度

“孝悌”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西周时期，以“亲亲”和“尊尊”为中心建立起了宗法制度，“至孝悌爱”观念由此逐渐成型。

春秋战国时期孝悌文化进一步系统化，上升为华夏全民族的家庭道德基石和伦理规范。

西汉时孝悌观念进一步纳入了国家政治制度的范畴。从此，孝悌意识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，不但规范着家庭秩序和社会等级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伦理制度，影响着国家秩序的建立与完善，秦汉及魏晋，“举孝廉”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察举制度。

舜的高尚道德情操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西汉经学家刘向编辑的《孝子传》，舜列其中。元代郭居敬编录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》将24位古人孝道的故事辑录成书，开篇《孝感动天》就是关于舜的孝敬故事。其后历朝历代上千年，从国家层面到社会民间底层，都把孝悌作为我们民族最基本的人性道德要求和做人的基本规范。可以说，舜所建立的孝悌道德规范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基因中，始终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脉里。

虞舜文化是一部华夏原始先民色彩斑斓、气势磅礴的百科全书。舜所倡导并实践的“德治”“天地人和”“德为先，重教化”“孝悌、仁爱”“四方巡守”“祭拜四岳”等舜文化精髓，构筑了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主干，成为中华文明光耀万古的传统文化瑰宝。

《潍坊晚报》

生活史

宋朝人吃饼技法多

刘中才

宋朝时，中原地区广种粟麦，北方多以面食为主，饼由此成为宋朝百姓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主食。散文家汪曾祺在《宋朝人的吃喝》中描述过宋朝人的饮食风俗：“宋朝的面食品类甚多。我们现在叫作主食，宋人却叫‘从食’。面食主要是饼。《水浒》动辄说‘回些面来打饼’。饼有门油、菊花、宽焦、侧厚、油锅……《东京梦华录》载武成王庙海州张家、皇建院前郑家最盛，每家有五十余炉。五十几个炉子一起烙饼，真是好家伙！”可见，宋朝人是多么喜欢吃饼。

据记载，宋时，凡面粉制成的食物均可叫“饼”：烤制的叫烧饼，水煮的为汤饼，上笼蒸的是蒸饼，油炸的称为环饼。宋朝的饼不仅门类多，而且同一门类又分为不同的种属。比如烧饼，就有门油、宽焦、侧厚、髓饼、满麻等品种；再如蒸饼，又有炊饼、笼饼等多种叫法；我们现在常吃的面条，宋代叫汤饼，汤饼又可以细分为软羊面、桐皮面、插图肉面、桐皮熟脍面等。

宋朝人爱吃饼，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。一是宋朝农业生产空前发展，黄河流域盛产粟麦。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稳增，百姓生活富足有余，以面当家成为趋势。二是宋朝的面食物物美价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吾辈入店，则用一等玻璃浅棱碗，谓之‘碧碗’，亦谓之‘造羹’，菜蔬精细，谓之‘造羹’，每碗十文。”一碗精致的汤羹，只要十文铜钱，约合现在的人民币几块钱。这样低廉的物价水平，也难怪宋朝人吃饼吃出花样了。

《科教新报》

名人轶事

汪曾祺：平凡小事写情趣

吴裕成

汪曾祺从运河边上的高邮县城走出。他曾讲，上小学时，一路上的作坊店铺，手艺人的制作，每日里百看不厌，那勤劳、笃实、清甜、微苦的生活气息注入记忆，许多作品取材于“这座封闭的、褪色的‘小城’”。他写故乡的人和事，写运河上缓缓移动的船，也写吃食，如腌出红油的鸭蛋，如蚕豆。一次，我与叶楠聊作家作品。叶楠以影视剧本写作见长，成名作是《甲午海战》。叶楠取来广州新出版的一本刊物，让我看汪曾祺的新作《蚕豆》，并啧啧称赞，说这是能将平凡小事写出情趣来的高手。

有一次，听我说林希的津味小说《蝈蝈四爷》被话剧搬演，汪先生很感兴趣，问舞台上怎样表现蟋蟀相斗？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处理。又问是否用天津话表演？我说那当然，并且还有角色操杨柳柳口音。汪曾祺说，天津话有特色，但一些语句不容易写出来，比如过去有人用天津话写小说——他学着口音：“夜个（昨天）那哥俩儿（打）起来了……”汪曾祺上世纪50年代曾任《说说唱唱》《民间文学》编辑，对各地风土民情多有了解。

汪先生为孙犁先生的《荷花淀》写剧本，是听汪夫人说起的。这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选题。北影约了几个本子都不满意。导演来找汪曾祺，说您若不接，这个选题就只能放弃了。汪夫人讲话时，先生并不插话，随后只是平淡地对我说，这个剧本有难度。两年后再拜访，提及此事，汪先生告诉我剧本发表在《电影创作》上，题名《炮火中的荷花》。

一家出版社筹备出版古典小说评点本，李国文评《三国演义》，王蒙评《红楼梦》，邀他承接《水浒传》，没应。汪先生对我说：“《水浒》这本书我自己还没读懂，怎么能以昏昏，使人昭昭呢？比如小说开始描写九天玄女，含义何在？弄不清楚。”汪曾祺说，有人讲李逵造反最彻底，但挥板斧砍杀的是老百姓；我倒觉得鲁智深最可爱，你看他救人，想得多周到。

汪曾祺家住天坛南一座高层住宅楼的一个单元。居室布置不很讲究，堆摞的书，摆放的书，略显凌乱。壁上挂他画的一幅画，画法非同一般，红色块、蓝色块、绿色块的错落叠加，堆出串串葡萄，钤着印章。后来，那壁上换了画，墨叶红荷，仍是他的作品。

《天津日报》

文史小考

古人笔下的康乃馨



任蓉华

在母亲节这个一年一度的感恩日子里，人们对有着“母亲花”之称的康乃馨的关注度火速升温。虽然母亲节并非我国的传统节日，是近些年才从西方传入的，但康乃馨却是我国不折不扣的本土花卉。康乃馨是石竹花的英文音译。在我国，康乃馨名为石竹、石菊、秀竹等，低矮小巧，因为茎干的节间膨大如竹，被冠以“竹”名。它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，通过一些古诗词，我们可一窥古人眼中的康乃馨。

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司空曙，有一首诗为《云阳寺石竹花》：“一自幽山别，相逢此寺中。高低俱出叶，深浅不分丛。野蝶难争白，庭榴暗让红。谁怜芳最久，春露到秋风。”作者通过石竹花与蝶、榴的对比，勾勒出石竹花的动人姿态，又以“春露到秋风”点明石竹花的花期之长。

唐末名诗僧齐己，写有诗《石竹花》：“石竹花开照庭石，红鲜自禀离

官色。一枝两枝初笑风，猩猩血泼低低丛。常嗟世眼无真鉴，却被丹青苦相陷。谁为根寻造化功，为君吐出淳元胆。白日当午方盛开，彤霞灼灼临池台。繁香浓艳如未已，粉蝶游蜂狂欲死。”这位被纪晓岚称为“唐诗僧以齐己为第一”的方外之人，赋予了石竹花无限的禅意。

一代名相王安石，写有《石竹花二首》，其中之一云：“春归幽谷始成丛，地面芬敷浅浅红。车马不临谁见赏，可怜亦解度春度。”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石竹的爱慕，却又怜惜它不被世人赏识，以物托情，暗喻他的变法所遭遇的阻挠。

另外，唐代诗人顾况有一首咏石竹花的诗，名为《道场上人院石竹花歌》：“道场房前石竹丛，深浅浅紫，深浅浅红。婵娟灼烁委清露，小枝小叶飘香风。上人心中如镜中，永日垂帘观色空。”唐代农学家、诗人陆龟蒙的诗《石竹花咏》曰：“曾看南朝画国娃，古罗衣上碎明霞。而今莫共金钱斗，买却春风是此花。”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皇甫冉在《病中对石

竹花》诗中写道：“散点空阶下，闲凝细雨中。那能久相伴，嗟尔滞秋风。”古代诗人描写石竹的诗，不胜枚举。

石竹生命力顽强，花色和品种十分丰富，到了清代，被广泛栽植到皇家园林中。清初园艺学家陈淏子在《花镜》中说它“枝叶如茗，纤细而青翠”。《广群芳谱》中说：“石竹草品，织细而青翠，花有五色、单叶、千叶，又有剪萼，娇艳夺目，娟动人。”由此可见，石竹是丰富夏季园林植物景观的重要花卉资源。据说，乾隆皇帝很喜欢石竹这种清幽的花卉，经常让宫廷画师绘制石竹图，并亲自在画卷上题诗，比如“鞭娇娟小卉足清幽，张耒还思王子猷”“石侧娟娟致清幽，有枝有叶却非非”等。

石竹虽非名贵花卉，但色彩缤纷，姿态万千，又耐瘠寒，花期可以从暮春一直延续至仲秋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特性，人们才选择它作为母亲节的象征，以表达对母亲身处逆境却坚韧不拔、爱子之情直至终老的歌颂。

《汴梁晚报》